



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究竟说了些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 张琦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于 2013 年 9 月以法文出版，2014 年 3 月英文版问世，中文版也在加紧翻译出版过程中。

《21 世纪资本论》的主题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历史演进。用数据说话，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色。通过发掘和整理政府统计数据、纳税单据、银行账目、乃至报刊杂志等史料，皮凯蒂及其团队将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上溯到 18 世纪末，建立起跨越三个世纪、涉及二十余国的庞大历史数据库。此书就是以这一数据库为基础的。

该书英文版发行之后，迅速掀起了一波销售狂潮，并引发众多学者和媒体的广泛讨论。粗略统计，截至 2014 年 7 月，该书英文版在全世界已售出 45 万册，法文版售出 15 万册，另有数量无法统计的电子版广为流传。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短短几个月内能有这么大的销量和影响力是十分少见的。

此书究竟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什么重大的发现，竟然引来如此大的读者群和讨论的热情呢？

一、四大基本观点和一个大胆预测

借助于财富、收入、工资、资本等有关分配变量的长历史时段的丰富数据和资料，皮凯蒂得出了引人注目的一组结论或观点。

观点之一：如果放任其自流，纯粹资本主义（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天生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加剧且得到无限持续的长期内在趋势。在这种长期趋势中，核心机制是资本报酬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r > g$ ）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自然的、自发的”动态机制交织着“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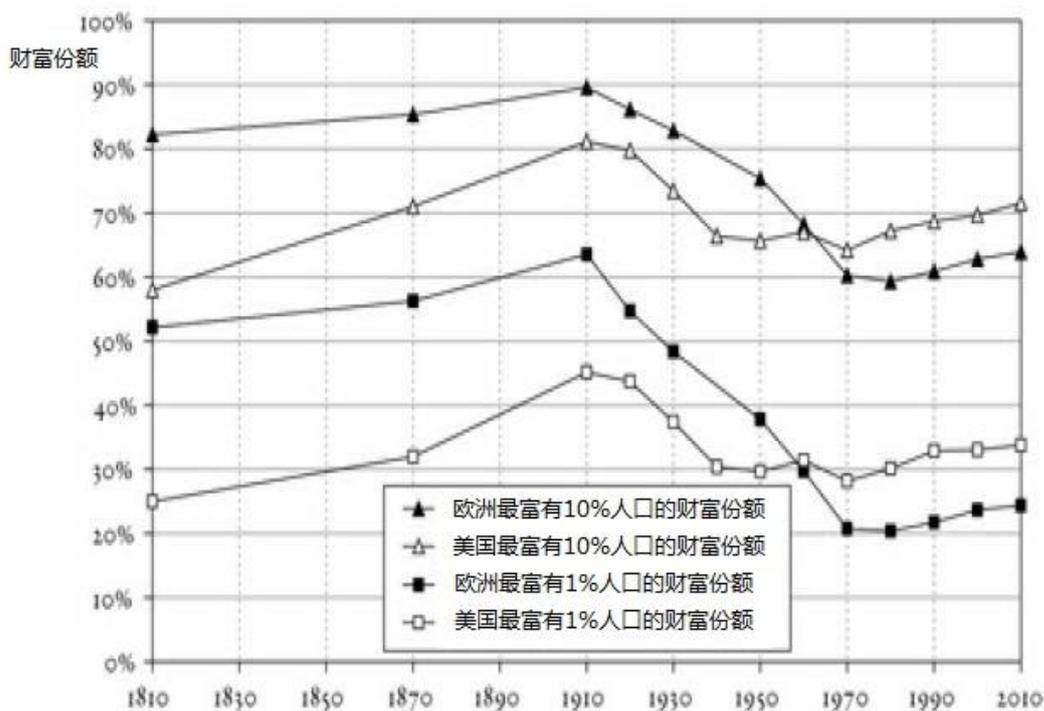
等化”（收敛）和“差异化”（扩大化）这样两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均等化”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虽然市场上劳动的流动性及其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也会对“均等化”产生影响，但其影响弱于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化”包括两股力量：一是高收入者（精英阶层）快速且极大地拉开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距；二是与财富积累和集中过程相连的一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 $r > g$ ）。

如果放任其自流，那么，“均等化”的力量不足以抵消“差异化”的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后一种力量中存在着强大的 $r > g$ 的机制。只要资本报酬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增长就会比典型的靠劳动获得收入者快得多。

可观察到的欧美国家近 300 年的数据表明，资本报酬率平均维持在每年 4%–5%，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2%（P352,354¹）。如果 5% 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则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这些事实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下述两幅图描述了欧美国家的这种历史演进。

图 1：欧美（1810-2010 年间）财富不均等的变化（p.349）



¹ 本文括号内的页码为该英文版页码，下同。



图 1 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上升”的“U 形”过程。如图 1 所示，无论是用最富 10%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还是用最富 1%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20 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均呈现出“U 形”的变化轨迹。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其最富 10%人口的财富份额从 20 世纪初的 90%降至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 60%左右，随后保持这一比重直到八十年代。但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一比重又开始上升，目前已升至 65%左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低于欧洲，其最富 10%人口的财富份额为 80%，但自 1970 年以来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目前最富 10%人口的财富份额已升至 70%以上。

图 2：欧美（1900-2010 年间）最富 10%人口的收入份额（p.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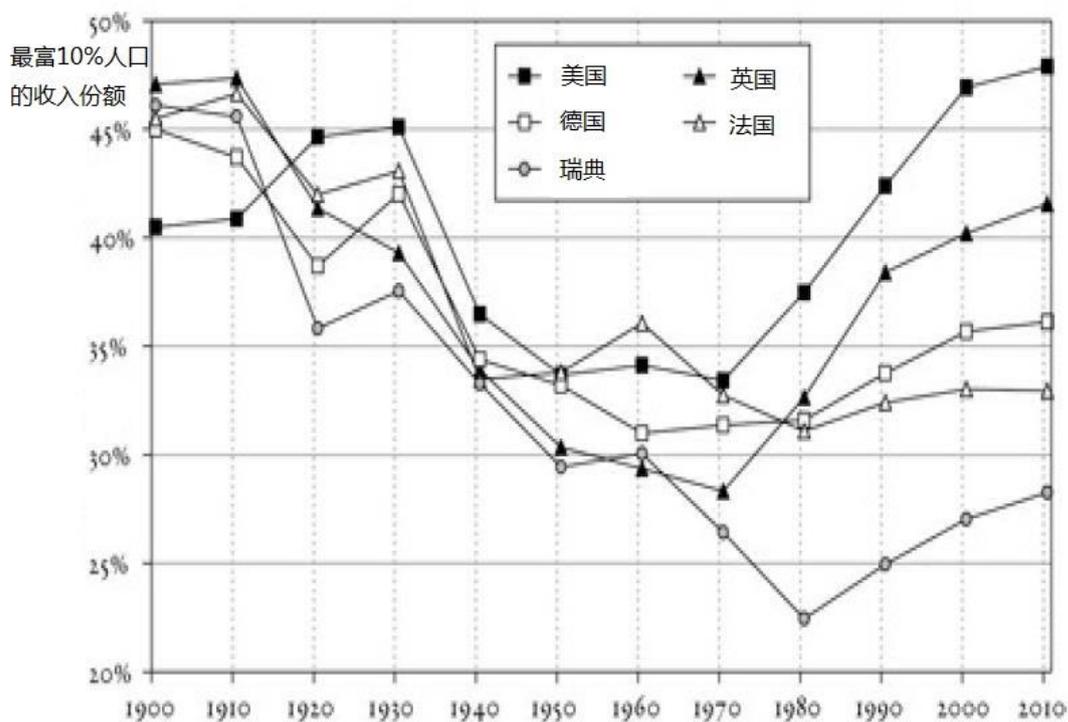


图 2 聚焦于 20 世纪，采用最富 10%人口的收入份额这一指标，展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瑞典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看出，欧美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在 20 世纪同样显出“U 形”变化轨迹，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态势。目前，从国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来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最高，2010 年其最富 10%人口的收入份额已接近 50%；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的不平等程度最低，2010 年起最富 10%人口的收入份额只有 25%左右。



皮凯蒂对 20 世纪 U 形图形（其它几个变量也都呈现出这种特征）的变化轨迹有一个创见性的解释：20 世纪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准确地说是 1910 年到 1945 年有所扭转），并不像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假说”所预言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是对资本主义长期内在趋势的一种偏离，而且作用机制也并不是这种假说所说的市场机制！

按照库兹涅茨的“倒 U 形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状况将经历一个恶化的阶段，收入不平等会加剧；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改善，收入不平等终将得到缓解。要言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的程度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轨迹。因此，20 世纪欧美各国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

皮凯蒂认为，真相不是这样的！他批评说，库兹涅茨曲线是建立在 1914-1945 年间的短期历史数据之上的；而且，在这一期间，不平等程度急剧大幅度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使然，确切地说，是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其对精英阶层拥有的巨额财富和资本造成的毁灭性冲击，以及这一期间对财富和资本收入征收很高的累进税等制度性因素。正是这类因素，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暂时偏离了“长期趋势”。

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皮凯蒂强调，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是资本报酬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所谓的“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不平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这正是欧美各国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之后最终又走上“上升”之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观点之二：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基尼系数的大小，而在于不平等结构的细节之中。正是在这类细节中，我们才能发现 $r > g$ 在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扩散，来自劳动收入的差距会被压缩到一个相对温和的程度。但是，财富（资本）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与 $r > g$ 之力量的结合，则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基尼系数之类的单一的综合指标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



虽然有其用处，但会掩盖不平等的真相，不足以揭示不平等的复杂事实，更不足以揭示其间的内在机制，甚至会混淆在不平等中正在起作用的经济机制与对不平等现象是否合理的规范性证明（p.266）。

仅仅从上述长期趋势，也不足以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不平等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基于这种认识，皮凯蒂认为，思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更好方式是考察不平等的内部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不平等的本质。例如，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其间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机制和含义是极为不同的。

在有数据可以推算的最近 200 年间，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法国，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 1800-1810 年的 35%-40% 下降到 2000-2010 年的 25%-30%，相应地，劳动的收入份额从 60%-65% 提高到 70%-75%（p.223）。其它欧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最近几十年，在这些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一般稳定在 $\frac{2}{3}$ 和 $\frac{3}{4}$ 之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缓和！

那么，欧美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虽然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相对温和，但内部差距仍然严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群大约拿到工资总额的20%，最底层50%拿到约35%。在劳动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p.246）。

为什么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主要的原因应到制度层面中寻找。劳动力市场是以具体的规则和协商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建构。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各种制度（例如最低工资法、劳资谈判机制等），决定了工资的等级结构（pp.307-310）。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反映的正是这类制度的差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皮凯蒂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崛起”是一种“盎格鲁-萨克逊现象”。这种现象意指：公司经理获得“超级薪金”，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国家特有的突出现



象。这种现象使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大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

第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

在整个19世纪，财富的高度集中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特征。直至1900-1910年，法国、英国、瑞典和其它有数据可证的国家，最富有的10%群体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国民财富，比重达到90%。其中，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超过50%的财富。居于中等的40%人群拥有的财富刚好超过国民财富的5%。就财富的占有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p.261）！

之后，由于战争、收入和累进遗产税的实施等原因，财富的集中程度大幅下降，但是**财富分配仍然悬殊**。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仍然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50%。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在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达到70%（p.248）。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第三，与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应，资本收入的分配高度不平等。

最富有者的私人财富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房地产，另一部分是金融和商业资本。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资本所有权的分配。只要把资本报酬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r > g$ ）的事实与上述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资本收入在拉大贫富差距。

按税前计算并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该书认为，通货膨胀有利于更有能力管理资产的富人），在18、19世纪，英法两国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是35%-40%，到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20世纪末开始又回升到25%-30%（“U形图”）。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资本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情形。

即便是以平等著称的北欧，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北欧各国，劳动收入最高10%人群的劳动收入只占全部劳动收入的20%，而资本收入最高10%人群的资本收入却占到全部资本收入的50%。至于在其它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差距更大。例如，在2010年的美国，劳动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劳动收入占全部劳动收入的35%；而资本收入最高



的 10% 人群，其资本收入占全部资本收入的比重高达 70% (pp.247-249)。

总体上看，财富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即便在最平等的北欧，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的程度，也高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皮凯蒂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平等的“两个世界”！

观点之三：最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问题。推动上述各种数据所显示的不平等程度的机制，正在破坏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努力来获得成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的健全基础 (p.571)。

仅仅从现实中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且在扩大的事实，并不能直接引出它们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此悬殊的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其间的观点错综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主要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财富和收入的获得满足程序公正原则——初始获得的公正和财产转移的公正，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不管差距有多大。因此，他们总体上反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第二个阵营比较复杂，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追求某种平等主义的理想。他们认为，放任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由市场社会既不公平也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政府的政策来修正这种社会经济体的缺陷，既要给每个人提供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也要培养低收入人群利用这种平等机会的能力。因此，他们总体上倡导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如果我们要对皮凯蒂进行归类，那么不妨把他归为第二阵营。但是，他的论证也自有其特色。他认为，“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在他看来，上述各种数据显示出的不平等程度的不合理性，主要在于财富自我膨胀机制对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破坏！一方面，不平等结构的“两个世界”



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在19世纪，最富有的1%群体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英集团！现在，这部份人群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对社会前景、政治和经济秩序施加着巨大的影响（p.254）。另一方面，它在破坏着民主社会崇尚奋斗的世界观，即：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应当由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出身和拥有的某些特权来决定（p.422）。历史和现实中的两大因素——“遗产型资本主义”（食利者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种基本价值观。

特别是其中的“遗产型资本主义”，使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破坏着民主社会的平等价值观，而且在培养出一个“食利者”社会。²虽然在现在的欧美国家，“超级世袭者”已经比较少，但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小食利者”社会，“食利者”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化。那就是：他们之所以能获益，与其努力无任何关系，纯粹属于“出身”这一偶然因素！

以法国为例，从流量数据来看，每年通过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而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达到最高，为25%左右，随后大幅下降，在1950年时达到最低，仅为5%左右，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达15%左右（p.399）。更令人震惊的是存量数据，仍以法国为例，个人财富中由继承而得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总量的比重同样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高达90%，随后大幅下降，在20世纪七十年代达到最低，但仍高于40%，随后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接近70%（p.402）。这些数据表明，所谓“劳动致富”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劳动是可以增加收入，但无论如何都赶不上“食利者”的致富速度。并且，按照皮凯蒂的估算，这一比重在21世纪极有可能继续攀升，无怪乎有媒体据此惊呼21世纪将是一个“拼爹世纪”！

观点之四：不平等的历史是由两组错综复杂的因素互动作用过程所塑造而成的。这两组因素是：经济行为主体、社会民众和政治活动家对于“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看法；上述行为主体的相对权力（或力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集体选择（p.20）。正因为如此，分配的历史一直深深地根植于政治之中，不能把分配问题简化为纯粹的经济机制问题。

² 虽然我们无法对家庭背景影响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给出明晰的描述，但至少从财产继承的指标，从一个侧面给出量化的说明。



虽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于再分配政策或制度是否合理争论不休，铁的事实是：关于社会公正的抽象原则，社会是存在某些共识的；20 世纪的文明社会都在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施着广泛的再分配。这两个事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现代文明社会的再分配是以一组个人的社会基本权利为基础展开的。这种社会权利观的政治和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独立宣言》宣布，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人权宣言》也宣布，人生而自由，并保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虽然 18 世纪产生于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体系主要是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但是，20 世纪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在观念上也源于此。

欧美国家在实践中把人的平等权利拓展到教育、健康、基本生活保障等领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1930-1950 年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大幅度压缩，虽然与战争因素有关，但也与经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一组以追求平等为导向的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制的引入）相关。正是这组政策，使 1960-1975 年间的差距能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类似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的再次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决策转向的产物。这次的政治转向，以能力和效率的名义，对制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税收和金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有利于市场精英的调整！

一个大胆预测：21 世纪的欧美财富和收入分配将重归“长期趋势”！

除上述的主要论点之外，皮凯蒂还有一个激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推论，或者说是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21 世纪可能恢复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社会分配形态！那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形态。差异仅仅在于，20 世纪初是一种典型的“超级世袭资本主义”，而 21 世纪则可能是“超级世袭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

皮凯蒂认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有几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在 21 世纪继续上升。其一，资本收入比（资本/国民收入）已经重新上升到 20 世纪初的高度；其二，21 世纪的世界经济恐怕很难保持 20 世纪的高增长（ g 下降）；其三，资本回报率 r 可能会下降，但不足以抵消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从而难以避免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其四，如果资本回报率 r 下降的幅度小于经济增



长率 g 下降的幅度，则 $r > g$ 的作用将继续强化（ $r-g$ 扩大）；其五，来自劳动收入方面的趋势也不容乐观，“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加剧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趋势，从纯粹经济逻辑来看，21 世纪的不平等极有可能继续加剧，重新达到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二、进一步的评论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第一位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虽然他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假说，但由于缺乏足够长的历史数据，他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在皮凯蒂之前，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较长的历史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主要有 R. J. Lampman 的 *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3-1956*(1962)，Anthony Atkinson 和 A. J. Harrison 的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 1923-1972*(1978) 等著作。《21 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前的数年间，皮凯蒂也与其合作者发表了一批类似的高质量论文，由此得以跻身于这一领域第一流经济学家之列。但是，此书的出版则使他成为了一位享誉公众、媒体和社会各界全球知名的人物！

在此书中，皮凯蒂的最大贡献是，运用一组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本特征，让我们较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阶层分布和动态趋势的历史画面。在他之前，谁能看到这么清晰的变化轨迹呢？他描述的这幅画面和据此提出的一组观点，改变了人们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历史的理解，触动了资本主义的痛觉神经，从而也拨动了各路人马的神经。

然而，由此激起的评论却充满不实之辞。支持者有时用溢美的语言称赞它。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21 世纪资本论》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史蒂芬·厄兰格称这本书足以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一较高下；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赫西称这本书是“史诗”和“奠基石”；莱恩·古柏认为，它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奠定下思想基础；斯蒂文·博尔斯丁称它是一个“经济史对理论的、数学的经济模型的胜利”。有些批评者则用愤怒的语言批判说，“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点的中世纪般的仇视，……把结果的平等视为最终目的”。



我们不同意某些支持者过分高估此书价值的评论，我们认为，此书没有那么伟大。正如作者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他所要做的核心工作，只是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演变过程的历史分析。他的基本观点，更多的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疏于基于严密逻辑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例如，对财富和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不合理性，是他应该给出自己的答案的重大问题。但是，在书中他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甚至于很难搞清楚：他究竟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平观？其实，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可以在大量的文献中找到能支持他的论点的理论。

再如，他寄希望于民主制度，却对民主如何节制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趋势的问题，缺乏分析，甚至是一笔带过！他甚至对民主及其发展过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以为然！事实上，真正使欧美社会在 1945-1975 年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正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扩大和深化！

我们也不同意某些批评者的那种轻视的评论。虽然皮凯蒂所运用的数据的准确性是可以争论的，但他毕竟利用了至今为止最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揭示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和某些基本特征，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³更为重要的是，他基于历史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暴露了主流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或缺陷。

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假说”是主流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假说，学界早有争论，但主要集中在曲线的形态和影响因素的解释方面。皮凯蒂却指出，20 世纪出现的收入差距缩小，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而且，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这种假说所说的市场机制，而是外在于市场的其它机制。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库兹涅茨假说！

更重要的是，皮凯蒂的某些观点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理论启示。例如，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政治民主+自由市场”是历史的终结形态，它们的组合几乎是天合之作。这其实也一直是最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主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皮凯蒂却认为，“如果我们要想重新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控制，那么，

³ 例如，人力资本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能对劳动收入差距的压缩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有助于改善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的格局（p. 223, 306）。



就必须让民主尽其所能” (p.573)。他在接受采访时也称：“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

这种观点是否暗示着：民主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天然组成部分，而是它的一种外在力量？纯粹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将是对上述主流意识的沉重打击！

三、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21 世纪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酷事实⁴，但对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有警示作用。虽然我们没有皮凯蒂那样细致的数据，但从下述数据中还是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一组数据是收入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高低与社会稳定指数呈反比。国际上通常将收入基尼系数的 0.4 作为“警戒线”，即基尼系数超过 0.4 时，贫富差距将使社会不稳定。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 年为 0.479，2004 年为 0.473，2005 年为 0.485，2006 年为 0.487，2007 年为 0.484，2008 年为 0.491。之后逐步回落，2009 年为 0.490，2010 年为 0.481，2011 年为 0.477，2012 年为 0.474。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北欧和西欧国家，与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相当！

第二组数据是财富的基尼系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 年中国大陆财产的基尼系数为 0.45，2002 年为 0.55，2012 年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 0.73；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 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左右。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之外，欧元区绝大多数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都低于中国的 0.73。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占 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 45%的财富，而占人口 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 1.4%

⁴ 有人认为，皮凯蒂将新书命名为《21 世纪资本论》，显然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思。其实，这种评论并不贴切。他偏爱资本主义，因为它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只是不欣赏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皮凯蒂自己说的很明确：“我试图让分配问题以及对长期趋势的研究回归经济学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追随的是 19 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我与他们一个最重要区别在于我使用大量历史数据。”



的财富。

第三组数据是城乡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 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 2005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 2，中国名列其中；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 1.5 左右。

欧美国家实行了数十年累进制的遗产税和所得税，尚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没有遗产税，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挑战。例如，年轻群体（或多或少）感受到，家产或遗产的重要性正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拥有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来说更加重要。家产或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60 后”的影响。

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特殊的国情”来辩解，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平等和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理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平等。因此，就中国大陆而言，加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并对不动产、资本所得课征累进税，设立合理的起征点和税率结构，以此来压缩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于 2014 年 9 月 2 日供稿 编辑、审校：王砚峰）

关键词：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 评价